

陕西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济思想史系列
西北大学『211』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何炼成 彭立峰 张卫莉◎著

走向近代化的思想轨迹

名人·名著·经济思想

The Ideological Trajectory toward Modernization:
Nine Celebrities · Masterpieces · Economic Thoughts

文献出版社
ACADEMIC PRESS (CHINA)

013025247

F092.6

08

陕西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济思想史
西北大学“211”重点学科资助项

走向近代化的思想轨迹

名人·名著·经济思想

The Ideological Trajectory toward Modernization:
Nine Celebrities · Masterpieces · Economic Thoughts

何炼成 彭立峰 张卫莉◎著



北航

C163207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F092.6
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近代化的思想轨迹：名人·名著·经济思想/何炼成，彭立峰，张卫莉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

(陕西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济思想史系列)

ISBN 978-7-5097-4245-7

I. ①走… II. ①何… ②彭… ③张… III. ①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近代 IV. ①F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8032 号

陕西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济思想史系列

走向近代化的思想轨迹

——名人·名著·经济思想

著 者 / 何炼成 彭立峰 张卫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 (010) 59367226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项目统筹 / 恽 薇 林 尧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林 尧 许秀江

责任校对 / 王伟涛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245-7

定 价 / 59.00 元

印 张 / 20.25

字 数 / 327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走向近代化的思想轨迹——名人·名著·经济思想》是西北大学承担的省级重点学科“经济思想史”建设项目的建设成果之一，是西北大学这个学科的创始人何炼成教授主编并亲自撰写其中重要篇章的一部重要著作。何先生已经有八十五岁高龄，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导师和我人生道路上的领路人。看过我的前期著作的读者和学术界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我们的师生缘。老先生要我为此部专著作序，我尽管诚惶诚恐，却不敢不从命！

这部书的缘起，基于何先生对谭嗣同先烈的景仰一生不能释怀的情结。何先生和谭嗣同先辈都是湖南浏阳人，他出生的时候（1928年），谭嗣同已经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惨遭杀害30年了。但家乡人一直缅怀着在中国近代史上为变法求变、为国捐躯的这第一位流血牺牲者，流传着他的故事和思想。何老师的祖父和谭嗣同是同代人，祖父把对谭嗣同的怀念与追思时时渗透在对何炼成幼年家教的每个环节。所以，何先生从青少年起，就把学习谭嗣同、效法谭嗣同报效国家民族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20世纪50年代，在西北大学任教的青年学者何炼成，更是结合自己的专业，把研究谭嗣同经济思想和研究孙中山经济思想，作为西北大学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伊始阶段。何先生研究谭嗣同的早期文章——《谭嗣同经济思想略论》发表于《西北大学25周年校庆论文集》中，只是“文化大革命”动乱迫使他中断了研究。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学术复苏，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何老师的领导下，不仅在经济学、管理学的诸多主流领域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开拓创新，使该院成为“经济学家的摇篮”，而且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个阳春白雪领域也享誉学界。何老师把他研究谭嗣同经济思想的专论，发表在他的母校武汉大学校庆80周年纪念专刊上，具有双重纪念的特殊意义。在他主编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中，对谭嗣同的研究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后来均收入《何炼成选集》）。



但是，对谭嗣同的研究，何先生仍然认为还需要再深入下去，不仅仅限于经济思想史，还应该包括他的哲学思想和开放思想以及生平事迹、后人评价等。这等于是要写一部类似《谭嗣同评传》的专著了。在编完了自己的文集之后，2011年何先生把这件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学科组也把这部书列入出版计划。老先生放下一切，开始了夜以继日的伏案工作，并于2011年10月拿出了初稿，我作为助编，帮助先生确立了一个体系，赵麦茹做了电子稿件的版面处理。后来就这个文稿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邹东涛、赵学秀等又做了多次切磋，觉得为老先生出一本专著，要更厚重一些，更有学术价值和纪念意义。不妨请先生把对谭嗣同的研究放在当时中国求变图强、挽救民族危亡的大背景里，探索上自鸦片战争前夜，中经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下至辛亥革命，几代先进中国人探求救国救民、富国富民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足迹或者说思想轨迹。这样，谭嗣同就处在近代思想史承上启下的核心地位，而且该书也能同何先生近20年来一直研究创立的以“八个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相衔接，成为后者的思想前奏——《中国近代化思想史》。何先生欣然同意这个主题升华的修改建议。

主题的延伸和研究对象的增加，势必使工作量大大增加，必须给先生配助手。先生首先想到我这个大弟子。我本应无可推脱，但由于一年来自身病痛加重和其他俗务一时难以脱身，未敢领命（至今深为愧疚）。而此书的写作又时不我待，我在帮先生确立了主题、书名和写作框架后，建议约请刚毕业不久、先生的两个年轻女博士彭立峰和张卫莉来担此重任。刚好所确立的主题和所筛选的历史人物及其代表作正是她们博士论文所研究或者所涉及的部分内容。而此书的核心内容对于谭嗣同的经济思想研究，则仍然是何先生亲自担纲了。

本书所选的是在近代经济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九位思想家：魏源、洪秀全、洪仁玕、郑观应、张之洞、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从各位思想家的一部书入手对其经济思想中图强求变、师夷制夷、追赶世界发展潮流的内容及思想价值进行评介，见微知著，以求展示那个时代中国人追赶近代化潮流的思想轨迹，并通过追古思今，以求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建设事业的继续深入起到推动作用。

何炼成先生治经济思想史，向来持论中正平和，对历史人物不拔高、不压低。尽管他对自己家乡这位志士仁人一往情深，引以为隔世神交，但仍在作高度评价的同时指出其思想的时代局限性，表现了一种严肃的科学

态度和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这是何炼成教授的一贯学风。他的这种严谨求实的风格，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所以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也都体现了对历史人物评价公允的统一风格。

作为西北大学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第二代学人和学科建设此阶段的负责人，我恭敬而又欣喜地把此书推荐给学界同仁和年轻的一代学生、读者。

韦 苇

于西北大学桃园柯梦书屋

2013 年元月 8 日

目 录



魏源《圣武记》经济思想研究	1
一 “法无久不变”	2
二 除弊兴利	3
三 节用兴利	6
四 塞患兴利	9
五 开源兴利	15
六 结论	21
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经济思想研究	24
一 土地思想	25
二 产业思想	27
三 财政思想	33
四 结论	38
洪仁玕《资政新篇》经济思想研究	40
一 “因时制宜，审势而行”	41
二 “内修国政”	43
三 “外示信义”	47
四 评价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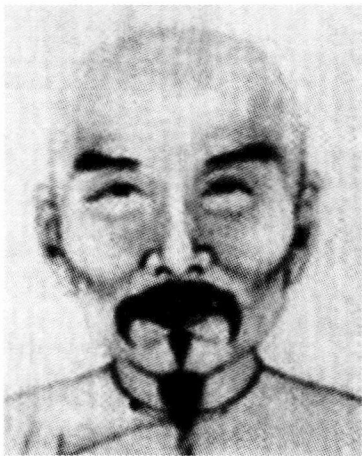
郑观应《盛世危言》经济思想研究	53
一 “非常之变局”下的“决胜于商战”	54
二 “立为商国”	60
三 “护商之良法”	69
四 “减厘税以恤商艰”	80
五 结论	106
张之洞《劝学篇》经济思想研究	109
一 经济改革指导思想	110
二 产业思想	115
三 企业思想	126
四 外债思想	130
五 结论	144
谭嗣同《仁学》经济思想研究	146
一 经济观和“两通”理论	149
二 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发展观	152
三 基本经济观点	154
四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蓝图	158
五 发展农业的“普鲁士道路”	161
六 结论	163
梁启超《变法通议》经济思想研究	165
一 “变亦变，不变亦变”	166
二 “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175
三 变法的哲学依据	179
四 结论	187

康有为《大同书》经济思想研究	189
一 西方经济的局限	190
二 大同的经济理想	196
三 大同经济理想的实现	206
四 志在大同，事在小康	212
五 结论	216
孙中山《建国方略》经济思想研究	219
一 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背景与相关 著作简介	220
二 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特点	225
三 孙中山的国民经济建设思想综述	238
四 孙中山论“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与 经济发展	259
五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经济思想	264
六 对孙中山经济思想的评价	279
七 结论	297

魏源《圣武记》经济思想研究

彭立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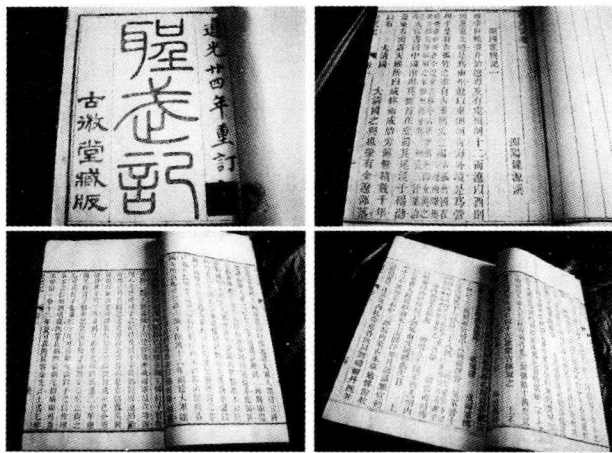
《圣武记》的作者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二年（1822年），魏源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1825年，他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聘请，代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协助江苏巡抚陶澍筹议漕粮海运及地方水利问题。1828年，他在北京任内阁中书。1829年他应礼部会试，不第。1831年，他因父亲病危南下，先后协助陶澍、林则徐、陆建瀛等封疆大吏处理各种实际政治、经济工作，成为与包世臣齐名的漕、盐、水利三大问题的专家。1845年考中进士后，他相继任江苏东台、兴化知县及高邮知州。1854年辞官后，他侨居兴化、杭州，潜心学佛。1857年，魏源病死杭州。魏源一生著述颇多，除《圣武记》外，还有《书古微》《诗古微》《海国图志》《元史新编》《古微堂诗集》《古微堂文集》《老子本义》《孙子集注》等著作。



魏源（1794～1857）

《圣武记》全书十四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成书，七月序于扬州，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重订于苏州，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复重订于扬州。三个本子比较起来，二十六年本公认为最优，本文即采用该版本。道光三十年（1850年），《圣武记》传入日本，其后有摘录翻刻本多种。在国内，《圣武记》自问世以来很受欢迎，多次刻印翻印。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卷二中称：“《圣武记》及《海国图志》尤为有用之书，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梁

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史学以记述现代为最重。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侪所最乐闻……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闾运之《湘军志》等。默深观察力颇锐敏，组织力颇精能。其书记载虽间有失实处，固不失为一杰作。”《圣武记》重在回顾清前期的“十全武功”，但其中《军储篇》等多涉及经济，本文仅探讨其中所蕴涵的经济思想。



《圣武记》

一 “法无久不变”

魏源在《圣武记叙》中说：“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距生于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畿辅靖贼之岁，始贡京师……晚侨江淮，海警沓至，忼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出其专涉兵事及尝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① 鸦片战争的失败强烈触动了魏源心中的“积感”，他深深地认识到唯有变革才能转弱为强，挽救民族危机。因此他在《圣武记·军储篇一》的开篇写道：“无政事则财

^① 魏源著《圣武记》（上），韩锡铎、孙文良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1页〔以下简称《圣武记》（上）〕。

用不足，法无久不变，运无往不复，作军储篇。”^①这是变革经济制度，为清政府的“武功”提供充足雄厚的“财用”。

魏源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②魏源认为既然“气化无一息不变”，“势则日变而不可复”，那么社会制度就应该随着情势的不同而不断发展变化，既不能“执古以绳今”，也不能“执今以律古”。在他看来，前者是“诬今”，后者是“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为学”^③。

魏源认为顺应着情势的变化，经济制度应适时加以变革，而变革的关键在于“利民”，在于“人情所群便”。以税收制度为例，魏源回顾了中国赋税制度的演进历程，指出“三代以上之天下，礼乐而已矣；三代以下之天下，赋役而已矣”。三代时“井田什一尚存，履亩未税，民惟困役，不困赋焉”^④。三代以后赋役并重，“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虽圣王复作，必不舍……雇役而为差役也”。^⑤“圣王复作”亦不能恢复古制，其关键原因是民意不可逆。他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⑥

在“海警沓至”之际，魏源认为应适时变法以“利民”强国。那么应该如何兴利呢？魏源给出了他的四大改革方案，即“有以除弊为兴利者，有以节用为兴利者，有以塞患为兴利者，有以开源为兴利者”^⑦。

二 除弊兴利

“何谓除弊之利？天下大政，利于国利于民者，必不利于中饱之人。

① 魏源著《圣武记》（下），韩锡铎、孙文良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552页[以下简称《圣武记》（下）]。

②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47页。

③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48页。

④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42页。

⑤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48页。

⑥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第468页。

⑦ 《圣武记》（下），第552页。



天储所仰，莫如漕、盐。行之二百岁，百窳千蠹，昼夜腴蚀。”^① 魏源曾做过多年的幕僚，对漕运、盐政等重要财政制度的积弊有着深刻的认识，其“有以除弊为兴利者”的经济改革，主要内容就是改革漕运和盐政。

（一）漕运：南漕海运

魏源深感漕运之积弊，认为“国家转漕七省，二百载来，帮费日重，银价日昂，本色折色日浮以困。于是把持之生监与侵渔之书役，交相为难，各执一词，弱肉强食，如圜无端”^②。1824年，淮决高堰，河道梗塞，漕运不通，朝廷诏下议海运。魏源认为“何谓除弊之利？天下大政，利于国，利于民者，必不利于中饱之人”，提出海运漕粮，并均由商人承办，不再由官府垄断。

早在明末清初，陆世仪就提出南漕海运，后来徐旭龄、尹继善、丘浚、蓝鼎元、姚文田和包世臣等人均力主其说。至魏源提出时，“和者百，哗者亦百。哗者何人？曰：在南则漕丁、水手持之，在北则通仓胥吏持之矣”^③。但魏源坚持认为“天下，势而已矣。国朝都海，与前代都河、都汴异，江浙滨海，与他省远海者异，是之谓地势。元、明海道官开之，本朝海道商开之，商人习海，犹河人习河，是之谓事势。河运通则渎以为常，河运梗则海以为变，是之谓时势。因势之法如何？道不待访也，舟不更造也，丁不再募、费不别筹也，因商道为运道，因商舟为运舟，因商估为运丁，因漕费为海运费”^④。他认为“渎告灾，非海无由也，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以海代河，商代官”乃是“乘天时人事至顺而行之”^⑤。为了保证商运的安全，魏源还建议“以粮艘由海运，以师艘护海运而已。江苏战舰由吴淞出口，浙江战舰由镇海出口，皆护本省海运之粮以达于天津。钦派验米大臣莅津收兑后，并阅护运之水师，然后给咨回省”^⑥。

在魏源等人的大力呼吁下，道光皇帝于1824年秋同意苏松常镇太仓诚府一州之粟全部海运。这次海运从道光五年（1825年）正月开始筹

① 《圣武记》（下），第552页。

②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340页。

③ 《圣武记》（下），第552页。

④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404页。

⑤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411页。

⑥ 《圣武记》（下），第545页。

备，分2次运输，至5月，两运皆竣。在贺长龄、陶澍等封疆大吏的支持和魏源、包世臣的周密筹划下，南漕海运取得成功。实践证明了魏源所言漕粮海运的四利、六便：“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①；“是役也，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于古未有”^②。因此，魏源认为“诚欲事半而功倍，一劳而永逸，百全而无弊，人心风俗日益厚，吏治日益盛，国计日益裕，必由是也，无他术也”^③，希望海运南漕能制度化、长效化。不过他并不主张全部漕粮海运，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江浙距海近，应行海运之法，而湖广、江西距海远，可仍行河运。他说“内河之贡道，天庾之正供，其不能全归于海运明矣。越重湖大江千余里，而至淮安，则屯丁、屯船不可裁亦明矣”，但应革除河漕之弊，“然江、楚赋轻，则输纳之要差缓于江苏；江、楚船重，则闸河之累亦甚于江苏。赋重者既于其赋赍之，船重者亦于其船治之而已”^④。

海运漕粮并非魏源首创，但是他完全依靠海商承办漕粮运输，并由军舰护送的主张，是前所罕见的。魏源认为“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⑤，公然将商人利益与国计、民生相提并论，反映出他对商人利益的重视。表明他对私商经营方式优越性的坚信。这对后世重商思想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盐政：改纲行票

盐税自两汉以来就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之一。清承明制，实行纲盐制，历时已久，积弊尽现：盐价虚高、官盐积压、私盐盛行、中饱成风、盐税收入不足等。当时包世臣等人倡导改纲行票，称“纲盐曷变行票盐乎？省改捆，省岸费，省私耗，省守候，省加派，省缓纳，曷为不行？”^⑥但是“默者百，挠者万。挠者即默者之人。曰：岸盐恐跌价则持之，岸吏恐裁费则持之，书吏、捆工恐清弊则持之矣”^⑦。

①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416页。

②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411页。

③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418页。

④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406页。

⑤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418～421页。

⑥ 《圣武记》（下），第552页。

⑦ 《圣武记》（下），第552页。

此时，魏源大力倡导改纲行票。他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与其使利出三孔二孔病国病民，曷若尽收中饱蠹蚀之权，使利出于一孔。”^① 魏源认为“欲敌私必先减价，减价必先轻本，轻本必先除弊”^②。“天下无兴利之法，去其弊则利自兴矣。鹺政无缉私之法，化私为官则官自畅矣。”^③ 他说：“票盐售价，不及纲盐之半，而纲商岸悬课绌，票商云趋鹺赴”，其关键在于“纲利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清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昔之利私而今之利公”^④。因此，魏源认为：“以十余疲乏之纲商，勉支全局，何如合十数省散商之财力，众擎易举？以一纲商任百十厮夥船户之侵蚀，何如众散商各自经理之核实？以纲埠店设口岸而规费无从遥制，何如散商势涣无可指索？以纲商本重势重，力不敌邻私，而反增夹带之私，何如散商本轻费轻，力足胜邻私，且化本省之私？”同时“江西、湖广粮船货船回空，皆可买载有课之盐，千金、数百金皆可办百引之票，云趋雾集，而私船皆变正课矣”^⑤。

改纲行票的基本精神是“化私为官”，即明清之际李雯在《蓼斋集》中就已提出并为后来盐务专家所传诵的名言“盖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的思路——废除纲商专卖制度，改由散商凭票自由运销，以消除纲商垄断，杜绝官吏胥役中饱蠹蚀。魏源改革盐政旨在裁费、轻本、化私、溢课。其改纲行票的改革方案，沿袭了刘晏以来许多盐政改革者的思路，为同时代的包世臣等人所共有，并无理论上的提升。但是魏源改革盐政思想对鸦片战争前后盐税改革影响很大。推动票盐制度施行，客观上减轻和削弱了晚清政府对商品流通领域的干预和控制。

三 节用兴利

魏源所谓的“节用兴利”，是指节约政府财政支出，以改善财政状况。其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废除普免田租和普免逋负；二是节省军费。

①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第431～432页。

②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第438页。

③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第438页。

④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第439页。

⑤ 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第438页。

(一) 废除普免田租和普免逋负

魏源称：“普赐田租，普免逋负，自古旷荡之仁，可行于文、景，不可行于宣、元之世。”^①在他看来，文、景之世可普免巨额田租和逋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府财政充足，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普免田租和逋负于国无害；二是吏治清明，普免田租和逋负均能落到实处，于民有利，即“苏轼所谓以不急之费，而被之以莫大之名”^②。

魏源认为到了道光朝时，由于客观情势的变化，普免田租和逋负就不适宜了。第一，普免田租和逋负并不能真正利民。魏源指出道光时“生齿颐矣，机变滋矣。有恃十载普免而争先逋欠者，则利顽民而不利于良民。官免赋而佃不免租，则利于富民而不利于贫民。海寇攻城，不及乡里，而遍免四乡之赋，则利于安堵之民而不利于被难之民”^③。诚如其言，普免田租和逋负名义上有利于百姓，但实际上百姓并未得到实惠，真正得到好处的是豪强富户，成为豪强富户的特权，已非“仁政”。第二，普免田租和逋负于国不利。魏源说：“国家正供，有岁入数千万之名，而常有逋欠千余万之实，异日国计愈匮，潦旱偏灾，何以蠲赈？则过厚于无事之民者，反无以备夫缓急望救之民。”^④因此，他建议废除普免田租和逋欠以利国利民。

的确，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晚清政府的财政状况陡然拮据。清前期一直遵循量入为出原则，财政收入主要源于常例收入，每年常例收入的来源和数额均有定制。政府根据常例收入来安排常例支出，各项常例支出不得混用，其总额通常小于定制的常例收入总额，由此确保了清前期长期的财政盈余。至道光前期，户部年均存银仍有 2716 余万两^⑤。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的财政支出受外来冲击而陡然增加。这些非常支出主要包括：战时军费支出 4000 万两和战争赔款 2100 万元（合银 1470 万两），两项合计 5470 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多的财政收入^⑥。晚清政府从此陷入财政危机。在此情形下，魏源提出废除普免田租和逋欠，旨在节约政府的税式支出，有利于改善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有利

① 《圣武记》（下），第 552 页。

② 《圣武记》（下），第 552 页。

③ 《圣武记》（下），第 552 页。

④ 《圣武记》（下），第 552 页。

⑤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第 142 页。

⑥ 许毅：《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第 72 页。

于减轻百姓的财政负担，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由于豪强富户是普免田租和逋欠的既得利益者，清政府为了不触犯其利益并未采纳魏源的这一建议。清政府转而又通过加重田赋、盐斤加价、开征厘金、举借外债等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财政手段虽然一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是它们加重了百姓的财政负担，削弱了民族经济发展的实力，激化了阶级矛盾，埋下了清政权覆灭的隐患。

（二）裁减军饷

魏源指出，“直省养兵，费天下正供之半，而兵伍不足正额三分之一。乾隆中叶，又以名粮改成实额，增六万之兵，即岁增百余万之饷，而缺伍益甚，冗糜益甚。夫养兵数十万，而不得一半之用”^①。诚如其言，军费一向是清政府常例支出的主要项目，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例，当年财政支出总计4221万两，其中常年军饷支出为2567万两，占总支出的60%。但是清后期，军队中将领吃空饷的情况普遍而严重，国家大量军费都被这些将领贪污中饱。吃空饷一方面导致国家军费支出浩繁；另一方面致使军队的战斗力极差。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上述弊病充分暴露。为了改善财政状况，为了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魏源建议“何如先复国初之旧额，再核目前之虚伍？或并三兵之费以养二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或并二兵之费以募一兵，使一兵当十兵之用”^②。

该建议若被采纳，清政府可借此机会削减军饷，整顿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当时军队中的将领多为八旗子弟，清政府不愿触动这些既得利益者，因此未采纳魏源的这一建议。当太平天国兴起时，焦头烂额的清政府仍未采纳魏源的这一建议，而是允许地方自筹经费办团练。地方武装部队的壮大和发展，一方面帮助清政府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助长了地方政府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削弱了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埋下了地方割据的隐患。

对于吃空饷等“冗糜”，魏源力主裁减，但他积极倡导清政府斥资购置新式炮舟。他说：“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③他认为：“中国之官炮，之战船，其工匠与监造之员，惟知畏累而省费，砲则并

① 《圣武记》（下），第552页。

② 《圣武记》（下），第552页。

③ 《圣武记》（下），第544页。